

追梦在神州

谢耘



谢耘

神州数码首席科学家，神州数码工程院院长，神州数码智慧城市业务集团总裁。1986、1988以及1993年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0年8月10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作为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我获得了国家教委奖学金，即将登上前往澳大利亚的航班开始留学生活。我的导师尚在美国访问，教研组党支部书记前来送别。他说：“这些年一直没有人能好好指导你，到那边希望你会有更好的机会。”我说：“最多两年我一定回来。”在他的眼中我看到了一丝带有宽容的不信任。带着从小就深深植入内心的梦想，我离开了北京，告别了祖国。

1992年8月29日，澳大利亚，悉尼国际机场。

当我作为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结束两年的留学生涯，挥别同学与朋友，登上国航CA173飞往北京的航班如期回国时，我心中对未来是一片茫然。在我离开前，两位入学不久的博士生在向导师征求选题建议时，导师说你们先去找一下谢耘吧。

那时，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问我，你真的要回到中国吗？那时，我的国内导师、清华大学著名教授留在了美国；那时，我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导师给我办

好了回来的手续；那时，西方还在制裁中国；那时，中国的高速公路还屈指可数；那时，在澳大利亚 Made in China 的字样，只能在普通商店中的低档商品上找到；那时，在许多外国人眼里，来到海外的中国人就像来要饭的盲流一样不受欢迎；那时，在悉尼大学图书馆的桌子上，有一些要中国人滚回去的留言；那时，我也认为除非世界再次发生全面战争，中国不可能缩短与西方的差距。

但我必须回去。不只是因为我的公派身份，更因为那片土地上的一切，滋生出了我的人生梦想。而我很清楚我不可能把这个梦想移栽到异国他乡而不凋零。所以，虽然留学两年使我曾经的梦想不是更近了，而是似乎越加遥远，我依然登上了回国的航班。

投生于一片土地是一个大因缘。进退得失，功名利禄，爱恨情仇都不应该改变你对这片土地的与生俱来的、必须兑现的承诺。

1993年1月3日，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

准备好第二天的博士论文答辩，晚饭后我来到图书馆浏览报纸期刊。在当天的《人民日报》

上我惊奇地看到了纪念我的爷爷、革命教育家谢台臣的文章。命运竟有如此的巧合。

第二天我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随后拿到我在清华大学的第三个学位。从出生开始，我就几乎没有离开过大学校园。不了解社会，如何能做一个优秀的灵魂工程师？所以毕业时我谢绝了系里让我在全校任选工作的好意，带着迷茫走向了企业。我的一个老师肯定地告诉我：“你不适合在企业工作。你的目标应该是做院士。”

路是人走出来的，我的梦想不是追求头上的光环。

1993年12月17日，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

我当时就职的民营企业先锋集团派我们一行五个人来美国，与美国大型国防电子企业TRW公司联合开发民用电视加密收费系统。TRW公司制造了绝大部分美国的军事卫星，据说这三个字母是当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三个同学姓氏的开头。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边检，我们被扣留盘问一个小时。这算不上屈辱，可也一定不是友善。

在洛杉矶的曼哈顿海滩边，我们与美国最顶尖的军事科学技术人员一起工作了六个月。这段经历让我大长见识茅塞顿开，我们也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当时我的一个同学认真地对我说：“你的思维方式与做事方式已经不适合中国国情了，还是留在美国吧。”

但我的梦不是美国梦。何况中国正需要改变。我在悉尼留学时一位马来西亚华裔同学曾经对我说：“中国的情况不好，更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回去吗？”

1995年3月初，广东，惠州。

在先锋集团生产基地的高温老化车间内，我在亲自测试刚下生产线的、与TRW公司共同开发的产品时遭到严重电击，与死神擦肩而过。现场距我一尺之遥、目睹整个过程的厂长说：“你一定有特异功能。要是换成别人，过

电持续这么长时间肯定没命了。”其实我没有被死神抓去实在是侥幸，在我感到心脏在电流的作用下开始剧烈地收缩后几秒钟内，一个同事跑去关掉了总闸。

随后我们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也用在了中国的心脏——中南海。曾经远离我的梦想在掉头回望。

1999年3月11日，深圳，五洲宾馆。

我与其他同事一起陪同联想集团柳传志总裁会见比尔·盖茨。柳总将一部联想掌上电脑作为礼物赠送给对方。这是我进入联想后带领团队自主设计的。

当我们把产品拿到北京计算机展览会上的时候，所有中外来宾看到它时都在问：“这个产品是你们从哪里OEM过来的？日本还是台湾？”没有人相信这是我们在中国大陆自己设计制造的。当时我还担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协助柳总整合计算所，实现大联想之梦。

我的梦想恍惚可见。

2000年1月末，北京，翠宫饭店。

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郭为找我谈话。联想集团准备拆分，郭为将领衔成立新公司，他将其命名为神州数码。郭总说：“咱们两个都是在大学入党，并担任学生干部。有些问题和你比较容易谈透，留下来咱们一起做吧。”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是信任。我没有问职位待遇等问题，决定与郭总一起创业。

我亲手做起来的掌上电脑业务联连同我花费巨大精力培养起来的整个技术团队划分到了联想电脑。联想集团的拆分让我的梦想再次远去。创业首先要生存，技术创新成了奢侈。从集团副总裁的职务开始，上上下下我辗转于不同的工作岗位。

2003年10月末，北京，上地神州数码总部。

在神州数码集团的半年经营会上，集团

荒岛·追梦在神州

常务副总裁总结集团半年业绩时说：“我们的软件公司在谢耘的带领下历史性地第一次实现了盈利。”

2006年4月1日，北京，苏州街神州数码大厦。

我出任神州数码与美国GE及日本TIS公司在两年多前合资组建的软件外包公司的董事长兼CEO。在我的带领下，那个财年公司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盈利。

看到这些结果，同事和朋友们都说我事业有成，但我觉得这一切与我的梦想毫无关系。我的梦想似乎已经无处可寻。

2007年5月中，北京，上地神州数码总部。

神州数码决定成立神州数码工程院，负责软件应用产品研发，准备调我出任院长。因为担心我不想离开软件外包公司的董事长兼CEO的职位，神州数码总裁郭为约我面谈。我说：“没有问题，我对技术工作更感兴趣。”但是在我的心里，梦想已经沉睡了很久很久。随后一个同事见到我说：“你放着那么好的职位不做，又来做技术，你让我们简直无法理解。”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梦想。

2008年1月元旦，北京，西二旗领秀硅谷。

在同事的推荐下，利用元旦假期我在家里一口气看完了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在许三多不断重复的“人活着要有意义”的激励下，我的梦想开始复苏。我决定动笔规划一个全新的产品。

在参与国家金税三期咨询与客户开会时，一个同事见到我手拿一本《离散数学》，便好奇地问道：“谢总您这是干什么？拿数学来消遣？”我说：“我准备设计新产品。”他瞪大眼睛：“不会吧老大？您这是在开玩笑。”脱离具体技术工作做公司高管这么多年，已经没人相信我还能重操旧业亲自做新产品

的设计。

但这确实不是玩笑，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虽然十几年没有做具体技术工作了，但是当年我们不也是从零开始的吗？何况这些年的工作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在我构思新产品的过程中我慢慢地发现，过去那些我觉得与我的梦想毫无关系的经历，其实都是宝贵的财富，都是追逐我的梦想时不可或缺的支撑。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当我们对命运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不理解命运的关爱。

2011年11月24日，北京，清华大学西阶教室。

我在清华大学的高端论坛—西阶论坛上主讲《中国企业的技术与产品创新》。在问答阶段，一个同学问我：“学长，我们都认为走上职场后技术是过渡，做管理或资本运作才算成功。可您为什么在管理上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后却又回来做技术了呢？”

我说：“因为我从小的梦想，就是用科学技术为社会、为国家做点儿有意义的事情。虽然这个梦想曾经离我而去，但是我却从未有过别的梦想。”

2012年12月6日，福建，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郭为亲自宣布中国第一个智慧城市市民融合服务平台在福州市开通，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与新闻频道均作了详细报道。这个平台就是我构思并完成顶层设计，组织神州数码工程院的同事开发并成功实施的。

2013年3月28日，北京，上地神州数码总部。

曾经担任美国陆军首席数据官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来访。他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并耐心回答了我们的提问。最后他客气地说：“谢院长您来做总结吧。”作为世界顶级大学的



教授他并没有兴趣了解我们这个中国企业的工作。我说：“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亲自领导并参与的一些可能与您的研究领域相关的工作吧。”十几分钟后，他竖起了大拇指说：“你们做的这个工作是非常前沿的，麻省理工学院也有一些教授在做同样的研究。有机会欢迎你们去交流。明年我组织的一个会议也希望你们能来介绍你们的工作。”

2013年6月7日，北京，上地神州数码工程院。

神州数码工程院去麻省理工学院参加学术交流的同事在介绍完访问情况后，我问道：“去世界顶级大学看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以后，你们是更有信心了还是失去信心了？”年轻的同事答道：“更有信心了。他们做的有关智慧城市方面的工作，基本都是一些局部点上的事情。我们与那些教授介绍我们的工作时，他们听完后常常会说 very interesting。我们工程院对问题的思考比他们考虑的层面要高。”

我对同事说：“工作20年，我第一次感觉自己离产业的国际前沿未被征服的高峰如此之近。只要大家努力，我想我能够带领大家做

出国际一流的工作。”

2013年7月2日，北京，上地神州数码总部。

由于宏观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公司的经营正在经历严峻的考验。神州数码工程院担任主角的创新业务也遭遇多方面的巨大挑战。

我对郭总讲：“我有信心带出一支一流的技术团队，做出一流的产品。和您做到今天是一种缘分。我很希望咱们能真的做成这件大事，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祖先，也对得起后人。”郭总说：“谢谢你的真诚。”

我曾多次与年轻的朋友讲：“生活在自己民族的上升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毛泽东时代，在我们年少的心中种下了追求社会公正与国家富强的种子；改革开放，为我们打开了国际视野，也给了我们在国际化舞台上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得以借助民族的复兴实现个人梦想，是莫大的幸运；匹夫之梦能够贡献于民族复兴于万一，则是个人的无上光荣。

有些梦想，值得用一生去追逐；有些梦想，需要用一生去追逐。❏